



宋代的勾栏瓦舍

【短史记】

宋代的街头唱词人

□孙葆元

宋词是用来唱的。

宋人给我们留下一万多首词，其中许多是我们今天也耳熟能详的，宋词也标志着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。

词怎么唱？一阙词牌就是一支曲谱，词作家的责任是把词写好，歌唱家自会吟唱。所以创作词叫“填词”。有那么多待唱的词，就有那么多时代的歌唱家。在宋人看来，词就像李清照在《词论》中所言，“可歌”是基本要素。因此词人重视自己作品的传唱，宋词演唱也出现在各种场合。也或许才让词在宋代如此兴盛！

宋代的歌者分三类，一类是宫廷歌唱家，在北宋叫教坊，是专门为皇家演出的，这里会聚着朝内一流的歌唱家和乐器演奏家，仅开封皇家就有四百多人。

与皇家教坊对应，北宋军队中也设有乐工，除了歌者，还有杂剧演员，表演傀儡戏的人员，有演奏琵琶、笙、箫、板、笛、杖鼓、羯鼓、大鼓的人员，统称诸军乐，仅保卫京畿驻军中的乐伎就有四百余人。所有艺人均由朝廷供养，可谓衣食无忧。

第二类艺术家则属于民间，他们在勾栏瓦舍里卖艺，寄身市井远不如宫廷艺人优越，他们受人欺侮，队伍里却不乏名家。据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载，歌唱家有李师师、徐婆惜、封宜奴、孙三四等；嘌唱弟子有：张七七、王京奴、左小四、安娘、毛团等；演杂剧的艺人则有张翠盖、张成率领的弟子薛子大、薛子小、俏枝儿、杨总惜、周寿奴等人。除此之外还聚集着演杖头傀儡戏的、悬丝傀儡戏的、讲史的、讲小说的、说浑话的、斗虫的、弄鬼的，林林总总煞是热闹。这可以说是汴京市井社会对于文化需求派生出的文化市场。杖头傀儡是用木棍支撑的傀儡，演员躲在幕幔下演出，悬丝傀儡正相反，是用丝绳吊起傀儡，演员在幕幔上边演出。讲史是评说以往，借史鉴今，元代称平话。讲小说是宋代的说唱艺术，讲些传奇、脂粉、灵怪故事。说浑话有点像今天的相声，说些滑稽诙谐的段子。宋人王灼在他的笔记《碧鸡漫志》中说，这种表演就是说一些“滑稽无赖语”，艺术形式起于北宋至和年间，“兖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”。

除了这些自主择业者，还有一些名伶被权贵收为家妓，宋孝宗淳熙五年，参知政事范成大被弹劾，退居苏州石湖故里。他是一位政绩卓著的朝臣，为了国家安危，曾不避刀斧出使金国，捍卫国家尊严，险些被杀。他又是一个伟大的词人，一生著作颇多。转眼多年过去了，宋光宗绍熙二年冬天，年轻的词人姜夔来拜访他，此时园中腊梅盛开，范成大就邀请姜夔为梅花作新词。姜夔欣然接受，不几日创作了两首词，一首《暗香》，一首《疏影》。范成大便命家中的乐工演唱。演唱的歌伎叫小红，她十分喜爱这两首词，尤其首句，“旧时月色，算几番照我，梅边吹笛？唤起玉人，不管清寒与攀摘”。何逊而今渐老，都忘却，春风词笔，但怪得，竹外疏花，香冷入瑶席。”是爱词，更是爱写词的人，范成大把这一切看在眼里。那年除夕，姜夔拜别范成大，要赶回湖州过年。临行，范成大将小红唤过来，赠给姜夔

妻，姜夔满载而归。范成大家的小红就是被供养得衣食无忧的歌伎。

小红是幸运的，像她这样的歌者大量寄生在勾栏瓦舍里。勾栏和瓦舍是宋代大型娱乐场，里面有戏台、神楼、腰棚（观众的雅座），瓦舍里还有赌场、妓院。三教九流，人员混杂，每个艺人都能在这里找到栖身之地。

南宋词人柳永长期混迹于此，不仅为歌手写词，还把歌手的名字写进他的词里，他在一首《西江月》里这样写道：“师师生得艳冶，香香于我情多，安安那更久比和。”词写得极其大胆，这首词也告诉我们勾栏里那些鲜活的人，让本应在红尘中消失的歌者留下芳名。歌手依赖着词人，只有词人能提供演唱的本子，词人也依赖着歌手，只有通过演唱才能让作品流传于世。宋代是一个唱和的时代，有多少宋词就有多少歌手。

第三类就是流动于街头的歌者，宋人送给这种职业一个名字，叫“路岐人”。据南宋词人周密记载，“或有路岐人，不入勾栏，只在要闹宽阔之处做场者，谓之打野呵。”这是一群游走的歌者，穿梭于巷间，来往于城乡，他们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，四海为家，然而人员庞大，占领着城乡演艺市场。周密又说，他们中“又有村落百戏之人，施儿带女，就街坊桥巷，呈百戏使艺，求觅铺席宅舍，钱酒之货。”周密也记下这些路岐人的名字，如王双莲、吕大夫等，这是音律最端正的歌手。

路岐人多唱嘌耍令，唱嘌与耍令是两个不同的含义。嘌唱，宋人在《都城记胜、瓦舍众伎》介绍说，这是“上鼓面唱令曲小词，驱驾虚声，纵弄官调”的演唱形式，“与叫果子，唱耍曲儿为一体，本只街市，今宅院往往有之”。这是路岐人特有的演唱曲种。最形象化的路岐人是《水浒传》中的阎婆惜，书中写道：宋江做押司时，有一次在路上行走，被王婆拦住，王婆是一个能把死人说活的媒婆，她指着路旁另一个婆子对宋江说，“押司不知，这一家儿，从东京来，不是这里人家，嫡亲三口儿，夫主阎公，有个女儿婆惜。他那阎公，平昔是个好唱的人，自小教得他那女儿婆惜，也会唱诸般耍令。”这就是一位施儿带女，行走江湖的路岐人。

那么，什么是要令？耍令是一种流行于市井的民俗俚曲，多用演唱表现底层的社会生活，曲调却带有番歌胡曲的因素。在宋代，朝廷与契丹和女真族多有领地之争，对这种曲子是禁止的，比如北宋宋徽宗时，尚书省上疏指出，“今来已降新乐，其旧来淫哇之声，如打断、哨笛、研鼓、十般舞之类，悉行禁止。”指的就是流行于民间的这些嘌唱与耍令。站在历史的高度，我们不能不说，这是民间艺术的融合呢？

路岐人是宋代独有的文化现象，从这个现象上我们看到，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，民众对于文化的需求。南宋末年，朝廷出台了一个对艺术家的“和雇”制度，所谓“和雇”，就是官家出钱，寻找优秀的乐工到宫廷或其他地方演出，朝廷每年犒军演出很多，这就需要大量演员，路岐人正好是这一文化需求的补充。

一定的文化现象必然与一定的经济现象联系在一起，当我们考察宋代的经济状况时，就不能忽略它的各种文化现象。

□钟青

根据播客搜索引擎Listen Notes数据，截至今年10月，中国大陆播客数量由2020年4月底的1万个增长为2.2万个。在今年6月发布的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》中，“播客”入选2020年高频词语范围。

播客的再度流行不禁令人好奇，在快节奏的当代社会，这些年轻人在关注和讨论些什么？用长音频形式来传递和分享观点，魅力在何处？

翻阅一些年轻人的媒介使用列表，播客身影频现，相较于大众更熟悉的概念“音频”，播客依旧是是个小众爱好。相对于有声书、知识付费音频等广泛意义上的声音产品，现在主流讨论下的中文播客，更倾向于“基于个人化表达、输出某类观点”的网络音频内容。

对互联网“大厂”员工李挺而言，最初进入播客创作领域的契机可以归结为七个字——“青年危机综合征”。

李挺的时间，是被播客切分的。“晚上9点之前当‘厂工’，9点之后做播客”。在李挺的生活中，播客的分量占据了50%，忙完工作，他与生活在其他城市的两位主播相聚线上会议室，制作一档名为《凑近点看》的播客。

进入社会工作四五年后，李挺感觉事情慢慢变得重复。长期写市场报告文案，每句话后面打满感叹号，有一天突然静下来想写点什么东西时，李挺发现，自己已经写不出来了。“想在表达欲彻底消失之前，赶紧找一个出口把所有的东西留下来”。

作为一档都市生活观察类播客，《凑近点看》节目选题来源于大家最“有话说”的生活热点。有一次李挺发现，职场中做好“领导向上管理”比自我努力更有用，而很荒诞的是，自己也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。这一系列对职场和领导的讨论，作为“厂工”主题系列播客的第三期，在小宇宙平台上获得了1.8万次收听，听众在评论里调侃：“这期真的好好笑，中国人一生的课题：领导。”

在科技类播客《二维吾码》主播王健飞看来，播客是一个强输出的媒介。“它或许不用有特别严谨的逻辑，但需要主播对很多事情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，否则评价不了，也没办法录播客。”

心理学博士王玮认为，通过播客进行观点分享和输出，也是“被看见”的一种方式。“表面上看是表达欲被满足，其实是满足心底作为独一无二的自我价值。”

“当代社会提供了很多可选择的空间，有机会实现更多面的自我。”王玮觉得，在八九个小时的工作之余，做播客可以满足部分人的心愿。“即使你并不在意赚不赚钱，但是它能够满足你的兴趣，成为工作与生活的良好补给。”

徐涛是播客音频制作公司声动活泼的联合创始人，播客《声东击西》曾入选苹果2018年度精选播客，在播客App小宇宙上的订阅量超9万。

播客“赛道”十分宽广，打开小宇宙App，从乌镇戏剧节到“白银时代”，从《鱿鱼游戏》到《再见爱人》，从默克尔的隐退到如何在社交App上找对象……时下流行的热点话题、艰深冷门的小众知识转换为声音模式下的纵深讨论，在沉闷的日常生活中挑动人们的思维风暴，重塑互联网时代的“精神乌托邦”。

播客《壮游者》主播Yang则偏好人文旅行目的地分享，Yang每期邀请一位实地旅行的嘉宾对谈分享。“我的节目不一定是如同专家授课一般100%的干货，我更希望做有趣的‘领路人’，把听众领到窗口，推开那扇窗，更宽厚的东西还要等他们自己去探索。”

“年轻人对于深刻思想的对撞是有渴望的。”王玮认为，在“速食”文化的环境中，大部分信息都流于表面，人们平时习惯了快速、高效的沟通模式，一件事分一二三迅速说完。两三个人聚焦于一个话题，进行一场态度正经、认真的深入交谈，这种场景格外稀缺。

播客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。“它给制作播客的人预留了一段时间，在这段单独切出的时间里进行深入交谈，双方都有着严肃的态度。听播客的人也会觉得，有一个单独的时间可以来了解这样一个话题，来听不同的内容。”

与夺取“眼球注意力”的短视频有所不同，播客捕捉的更多是用户的听觉“碎片时间”：独自开车、地铁通勤、健身房训练、家务活，还有睡觉前半小时。在这些场景下，人们转而思考一个新的问题：或许可以听点什么有价值的东西？

有专家认为，相比于视觉，听觉作为单一感官通道的媒介，对于注意力资源的占用度没那么高，能够“多线操作”于各种各样的场景，给予人们更多陪伴感和想象的空间。

于是，播客似乎达成了某种“神奇的平衡”。一方面，它为碎片化时间提供了获取信息的新方式，能够让人们一心二用地获取想要的内容，“性价比很高”；但另一方面，动辄60分钟的长音频对于新用户而言，又是一个门槛，声音传递信息的效率并不高，甚至不如3分钟阅读一段文字版音频内容介绍。

播客“资深玩家”展浩认为，听播客并不是一个严肃的活动。尽管信息增量足够大，但大家也不会特意抽出一段时间当网课来听，“只是想在不用眼睛的时候，获得感情上的共鸣，加上一点理性思考或冷门知识”。

王玮说：“成年人太沉迷于某种投入产出。投入一分钟干一件事情，就想得到这一分钟的回报；我花这一分钟看了书，就希望能够记住这一分钟的知识。”然而听觉本身效率不高，因此听众也不会给予它更多的希望。声音产品的低密度性、低侵扰性，恰好和用户的个体需求匹配，我此刻不需要高效学习，你给我一个不需要攫取太多注意力的信息提供方式。

除此之外，播客也满足了某种对生活的“控制感”。“当代人在信息消费上，想要有操控世界的感觉。”李挺将闲暇时听播客比作长辈们一边坐在沙发上打瞌睡，一边拒绝关掉电视机，在他看来，播客的内容能够将你带离身处的学习、工作场域。“无论是带你去知识场域、历史场域或者是戏剧场域，任何小众文化的场域，哪怕你是要用它来做白噪音、专注一件事情，它都能将你带离你现在身处的潮流。”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李皓冰 美编：陈明丽